

20世纪 70年代苏联犹太移民动机考察

梁中芳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系, 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 20世纪 70年代,在苏联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犹太人在移民的动机上有很大的区别。早期移民主要是边缘地区犹太人,他们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比较大,后期移民主要是生活在苏联中心地区的犹太人,他们主要是因为政治和文化因素而移民。

关键词: 苏联;犹太人;移民;动机

中图分类号: K51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06)06-0800-05

苏联犹太移民问题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出现的。1964 年,苏联第一次批准了 4 667 名犹太人移民以色列^[1]。此后,苏联犹太人移民意愿有所显现,但规模不大,影响有限,直到 70 年代初才渐成规模,并在 1979 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从 1970 年到 1979 年 10 年间,苏联犹太移民人数总计达到 226 602 人^{[2][53]}。深入考察 70 年代苏联犹太移民动机,就会发现,在苏联犹太移民的初期阶段(1968—1973),犹太移民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影响较大,他们移民的动机就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以色列。而构成移民主体的这部分犹太人主要生活在苏联的边缘地区,大部分是后并入苏联的,犹太民族认同感较强;而在 1973 年以后,犹太移民更多是出于政治、文化或经济等动机移民,构成移民主体的是来自苏联中心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的同化程度高,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

一、70 年代初期及之前苏联犹太移民动机

(一) 边缘地区犹太移民动机。

在 70 年代苏联犹太移民潮的初期阶段,移民群体很大部分是由苏联边缘地区犹太人组成。边缘地区犹太人指的是在二战期间及以后并入苏联的西部地区的犹太人以及南方一些自治共和国中的犹太人。虽然苏联犹太人的绝大多数居住在中心地区(主要是在俄罗斯、乌克

兰、白俄罗斯),但中心地区犹太移民在 1971 年移民总数中只占 10.6%,1972 年占到 14.6%,1973 年也只有 19.6%。相反,1968—1973 年的大规模移民是由占苏联犹太人总数不到 20% 的边缘地区的犹太人组成的^{[3][33]}。边缘地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很普遍,这些人很看重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从来没有忘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正是这种思想成为他们移民的主要动机。

苏联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他们苏维埃化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苏维埃化程度越低的地区,犹太民族意识越强,相反,苏维埃化程度越高,则他们的犹太民族意识越弱。据统计,在 1970 年有 37.6% 的苏联犹太人生活在俄罗斯联邦,这些地方的犹太人同化程度最高;西部的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乌克兰和南部的乌兹别克斯坦,在 1970 年拥有全苏联犹太人口的 49.4%,被同化的程度名列第二;而 10.4% 的苏联犹太人生活在西部的摩尔达维亚与立陶宛,南部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是所有苏联犹太人受同化程度影响最低的。^[4]

在苏联边缘地区同化程度较低的犹太人大都仍持有他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特别是根据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入苏联的犹太人,其民族意识最强烈。20 世纪 70 年代对苏联犹太移民的两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边缘犹太人与中心地区犹太人之间的犹太民族意识

收稿日期: 2006-09-12

作者简介: 梁中芳(1971-),女,江苏涟水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世界史研究。

差异。在移居到以色列的 150 名苏联犹太人中, 有很强或中等犹太民族意识的, 从波罗的海国家来的占到了 71%, 而从俄罗斯联邦来的只有 38%; 犹太民族意识比较低的, 从波罗的海国家来的比率是 29%, 而从中心地区来的却占到了 62%。1976 年在美国底特律对 132 名苏联犹太移民的采访也证实了这种情况, 25% 从苏联西部来的人说他们小时候家里就没有一点犹太人的气氛或只有部分, 而 74.8% 的人说家里多多少少甚至全部是犹太人的氛围, 而中心地带犹太人相应的比例是 46.9% 和 50.7%^{[2]29}。

就苏联早期犹太移民潮而言, 87% 的移民正是来自有着较强民族意识的边缘地区。1950 年 7 月, 以色列议会通过《回乡法》(Law of Return), 规定所有的犹太人, 无论其出生地如何, 一概赋予在以色列定居的权利^[5]。以色列在 1967 年“六五战争”中获得全胜, 更激起了边缘地区犹太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犹太复国主义情感, 促使他们不顾一切地以家庭团聚为理由向政府提出申请。这些边缘地区的犹太人会较早地申请移民, 而且也能如愿以偿, 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 二战后, 一大群前波兰公民仍滞留在苏联境内, 大多住在西部边境地区, 名义上仍保有波兰国籍。虽然斯大林政府剥夺了他们回国的权利, 但在赫鲁晓夫时代, 经过长期谈判, 签订了《苏波遣返协定》, 20 万前波兰公民包括 15 万犹太人终于返国, 很多遣返的犹太人最后就定居以色列。这些波兰犹太人住在苏联时与苏联其他犹太人关系密切, 他们大举移民到以色列为苏联犹太人树立了榜样, 令他们终身难忘。另一方面, 边缘地区犹太人与苏联外部的犹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为了家庭团聚申请出国签证, 获得成功的绝大多数是老人、退休者及体弱多病者。苏联政府迫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施加的压力, 同时政府认为留着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用, 只会增加经济负担, 因此这部分犹太人的签证申请比较容易获得批准。

(二) 中心地区犹太人移民动机。

相对于苏联边缘地区的犹太人而言, 中心地区犹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 苏维埃化程度较高, 大部分是专业的中等阶级, 在移民初期阶段激发边缘地区犹太人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在他们身上影响不大。他们移民的动机主要是对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失去信心,

同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重又推进斯大林化有关。特别是苏联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使他们对自己在苏联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同时, 还由于苏联政府停止了对西方广播电台的干扰, 使得苏联犹太人能够收听到更多的有关国内犹太人和其它的消息, 这也推动他们移民。

苏联中心地区的犹太人, 在经过斯大林时代所谓“黑暗年代”的沉默后, 到 60 年代中期开始活跃起来, 出现了有组织的联系紧密的犹太积极分子群体。这种变化首先是赫鲁晓夫时期非斯大林化带来的结果。非斯大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气氛和大众的心理状态。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金兹伯格曾说过: “我感激尼基塔, 不仅因为我们都被解放——否则我可能永久躺在了冻土上了——而且还因为他把我们从恐惧中拯救出来, 几乎是 10 年, 从 1955 年到 1965 年, 我没有再感到恐惧。”^{[2]137}

赫鲁晓夫改变苏联社会的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 也燃起了苏联知识分子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政策, 对苏联的知识分子极有吸引力”^{[6]81}。包括众多犹太人在内的苏联知识分子加入到政权重建以及国内的民主化运动中。传统的各种形式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社会政治组织, 重新恢复了生机, 而且很快成为犹太移民活跃分子们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 很多过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中营的生还者, 重又回到了城市而且经常组织研究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的活动。

然而, 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执掌政权后就改变了方向, 在对待改革和批判个人崇拜的态度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开始收紧解冻思潮的阀门, 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 暗中推进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新领导阶层的方针和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尤其知识界的反斯大林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他们希望 50 年代的‘解冻’会在当时导致一个真正的‘春天’”^[7]。但他们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在赫鲁晓夫时代曾一度被削弱的党的机构的专断权力又重新得到加强。“赫鲁晓夫是自由化的政治改革的倡导者, 他的垮台, 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保守势力的复苏。所谓‘新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开始出现……军队建设又有所加强。在赫鲁晓夫时期几乎已经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克格勃机构, 这时

也恢复了相当的实力。^{[6][171]}这时期政府主要的打击对象直接指向了苏联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1965年对苏联犹太作家安德鲁·西尼亚夫斯基和尤瑞·丹尼尔的审判,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作者在国外出书而对其进行审判,同时也是第一次被告不服罪的政治审判。还有1965年、1966年在基辅和利沃夫对年轻科学家的审判,指控他们是“恶意诽谤苏联体制”,这种行为造成了相当多的苏联知识分子尤其是犹太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反感。

苏联中心地区犹太人移民的想法也由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得到催化。“1968年对捷克的入侵摧毁了人们对‘更富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对‘异端分子’的镇压,把人们恣意关进疯人院,把许多程度不同的知识分子中持不同政见者赶到国外去,这一切都损害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威信,而且大大损伤了苏联的文化本身。”^[8]很多犹太知识分子成员在苏联的改革活动中充当了领导者,对他们而言,整个苏联的政治气候突然改变了,废弃了经济改革,政府的宣传机构非常熟练地将沙文主义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伪装下纳入到反对犹太人的活动中。所有这些极大地震撼了那些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民主人士,使得他们意志消沉,觉得在苏联的生活已经没有了前途了。莫斯科神经机械学家、地下出版物组织者鲁特曼,曾和其他人一样积极参与了对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审判的抗议活动,他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有很多希望。我们中的很多人相信在苏联可能有更多的自由。”但在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说:“关于未来我们一直都在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俄罗斯从来不会给我们比现在更多的自由,她的人民没有独立的传统,他们总是让自己让任何一个暴君来领导。他通过重新回到他的犹太人身份来解决他深刻的精神危机:“国家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的人们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我是俄国人。但我意识到我没有真正的认同俄国的祖先,我的确不能将自己看作是俄国历史潮流中的一分子。我觉得我不属于她……据我所知,我认为我能更自然地在犹太传统中确认我自己。无论如何……我觉得犹太人就是我的人民。我知道俄国人不是。”^{[2][141]}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政府停止了对西方广播电台的干扰,这使得苏联犹太人接受到了更

多的国内、国际消息,其中包括移民的消息。西方国家为了对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在慕尼黑设立了“自由电台”,不间断地广播。“美国之音”和“自由之声”等不仅提供关于外国事件的信息,也提供关于苏联国内事件的消息。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9][192-193]}。当然,西方国家的敌对宣传有其政治目的,是服务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而且在特定的时期里是出于冷战的需要,并非完全客观公正。“自由之声”广播委员会负责人毫不隐瞒其对苏联进行思想瓦解的宣传宗旨:“对于广大苏联青年完全不必要提出具体的正面的口号。只要引起他们对周围的气愤就足够了。”^{[9][193]}但通过这些电台,犹太移民得到了更多的消息,这些报道成为犹太移民运动和西方公众的不可缺少的联系渠道。有人曾经这样描绘西方电台在早期犹太移民运动发展中的作用:“以色列的呼声在使犹太人证实他们的犹太身份上有很大的帮助。以色列呼声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在世界历史上再没有这样的例子了。也许只有苏联外部电台对苏联内部的社会政治运动有很重要的贡献。以色列的声音在苏联犹太人的不同群体中都可以听到。”^{[2][138]}

在移民运动的初期阶段,从苏联中心地区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中,具有强烈犹太民族意识和出于犹太复国主义动机而移民的人是很少的。据调查显示,在1971—1975年间到达以色列的苏联移民,具有较强犹太民族意识或是符合以色列身份认定的,只有17.5%来自中心地带,他们来自俄罗斯、东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其中将近17%的人在1976年又离开了以色列,是其它地区苏联犹太移民离开以色列人数的3倍还多^{[3][42]}。所以在70年代移民潮的最初几年,中心地区犹太人更多是出于对国内政治民主化的失望而移民。

二、1973年后苏联犹太人的移民动机

1973年开始,苏联犹太移民去西方的人数开始急剧增多,1972年还只有251人,1973年就

猛增到 1 456 人。1971 年到 1981 年间苏联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以及西方的人数统计见表 1:

1973 年以后苏联犹太移民的主体是来自苏联中心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移民主要是出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因素的考虑,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是比较小的。美国社会工作者揭示了典型的苏联犹太移民不是特别热衷于推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且对犹太教有矛盾心理。1977—1978 年,一位多伦多的研究者调查了 53 位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发现没有宗教自由和缺少文化发展的机会是他们离开的原因^{[2]53}。从表 1 中可以看到,1973 年起去西方国家的犹太移民人数大幅度上升,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这些犹太人身上的复国主义情绪要比通常宣传的少得多。一些犹太人获得签证离开苏联到达维也纳,然后脱离去以色列的队伍,继续西行。这样的人从 1973 年就持续增长,到 1981 年竟超过了当年移民总人数的 80%。

表 1 移民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犹太人数^{[2]53}

年份	去以色列	去西方国家	总数
1971	12 839 (99.6%)	58 (0.4%)	12 897
1972	31 652 (99.2%)	251 (0.8%)	31 903
1973	33 477 (95.8%)	1 456 (4.2%)	34 933
1974	16 816 (81.3%)	3 879 (18.7%)	20 695
1975	8 523 (63.4%)	4 928 (36.6%)	13 451
1976	7 321 (51.1%)	7 004 (48.9%)	14 325
1977	8 348 (49.6%)	8 483 (50.4%)	16 831
1978	12 126 (41.8%)	16 867 (58.2%)	28 993
1979	17 614 (34.2%)	33 933 (65.8%)	51 547
1980	7 515 (35.0%)	13 956 (65.0%)	21 471
1981	1 820 (19.4%)	7 580 (80.6%)	9 400
总计	158 051 (61.6%)	98 395 (38.4%)	256 446

据研究者对 1978—1979 年间苏联 155 名犹太移民的调查,列出了移民可能离开的 21 条理由,并将其归为四大类:种族的(就业方面对犹太人的歧视);家庭的(渴望同家人团聚);经济的(渴望提高生活标准);政治或文化因素(感受思想的自由发挥受限及由此对智力成长的阻碍)。每一个接受调查的人被要求圈出 21 条中至少 8 条与其自身有联系的因素。据调查结果(见表 2)显示:政治和文化因素被多次提及,超过了其它因素,排在第二位的是经济因

素,接下来的是种族因素,最后是家庭因素。

具有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的人在移民动机上有很大的不同。在 1978—1979 年间,因为政治和文化原因而移居西方的苏联犹太人,调查显示他们往往有这样的一些特征:来自俄罗斯、受过高等教育,通常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不同年龄阶段的男人。有一位 37 岁的科学博士是前莫斯科大学教授和新西伯利亚科学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波兰参加学术活动后,1978 年决定移民。他回忆说:“在波兰的生活使我极度地震惊。我看到了一些对我来说在苏联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书籍、电影和戏剧,当我看到波兰的同事访问西方时带回来的幻灯片和照片时,我的欲望很受刺激。反犹主义不是让我移民的一个因素。我觉得作为一名犹太人是进入大学和找工作的障碍,而且这个障碍越来越重。但是这些障碍总会有一两种办法去解决它。缺少被苏联科学家看得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得多的国外的访问、旅行,是我离开的根本原因。”^{[2]59}

表 2 苏联犹太移民的动机(1978—1979)^{[2]51}

动 机	提及次数	比 例
政治或文化	319	38.8%
经 济	207	25.2%
种 族	179	21.8%
家 庭	117	14.2%
总 计	822	100.0%

有很多知识分子移民的主要动机是觉得事业停滞不前、前途渺茫或是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如同苏联著名的作家和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弗若内尔(Alexander Voronel)所说的“这无异使生命失去了意义”^[10]。有的移民觉得在苏联没有专业发展的机会;在国内缺乏公民权利和自由;缺少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信息接收上受到限制,以及总体上对文学、音乐以及现代艺术的限制,等等。

与此对应的是,对于因种族原因移民的这些人来说,“种族歧视”、“害怕孩子因为是犹太人而不能接受很好的教育和拥有很好的工作”是他们移民的主要动机。只有 3% 的人是因为缺少保持民族文化和宗教的机会而移民。由于民族因素而离开的人大都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之外,并且是以犹太民族登记的,他们处于不同的

年龄段、不同的教育和职业等级、不同性别,来自各种规模的城市。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位42岁的工程师,他说其移民是因为怕自己女儿是犹太人而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也因为自己单位在1978年8月搞的一次内部演讲,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同犹太复国主义作斗争”^[11],演讲中公然地叫嚣反犹,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不久他就和妻子讨论移民事宜。他的例子很平常,在他所在的单位中大约40%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是犹太人,在这一次演讲之前只有一个人离开苏联,在此之后有11个人马上决定移民了。

性别、年龄、注册民族、居住区域等因素同经济原因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但因经济原因而移民的人绝大部分是在职业的底层,没有上过大学,而且通常来自小城镇。在经济方面,诸如“收入低”、“住房困难”、“买必需品困难”、“要排队”,以及对经济压力的恐惧等,都成为他们移民的主要原因。他们对于那些具有较小压力而享有较好生活的环境,毫无疑问很感兴趣。

最后,移民动机是因为家庭因素的通常是妇女和超过50岁的老人。这些人因为“个人(家庭)原因而离开,因为我的亲戚们离开了”,“我得和他们在一起”,还有就是因为苏联限制去西方旅行而妨碍了他们家庭之间的联系。

总之,由于地域、职业、教育、年龄以及城市化程度不同而带来的犹太人不同程度的同化,导致了他们在移民的动机上也显示了不同的特点:来自布尔什维克统治最长地区的犹太人以及在大城市、大学以及在工作中最早承受压力的犹太人,是同化程度最高的,最有可能因为文化和政治原因而移民。相反,那些较少同化的犹太人,包括居住地并入苏联较晚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或者16岁时已把犹太民族作为他们民族登记在国内证件上的这部分人,倾向于种族原因移民。那些生活在苏联较边远地区的犹太人,忍受着较低的生活标准,他们主要是因为

经济原因而移民。由于家庭原因而移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因为家庭是他们生活的重心。

(本文写作得到杨春龙教授的精心指导,特此致谢!) <

参考文献:

- [1] [美] 泽夫·卡茨. 苏联主要民族手册[M]. 费孝通,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38
- [2] Victor Zaslavsky and Robert J. Brym. Soviet Jewish Emigr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 [3] Laurie P. Salitan.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in Contemporary Soviet Jewish Emigration, 1968-89[M]. London: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2
- [4] Mordechai Altshuler. Soviet Jew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M]. San Francisco: Greenwood Press, 1987: 69
- [5] 塞西尔·罗斯. 简明犹太民族史[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565
- [6] [苏] 罗伊·A·麦德维杰夫,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M]. 邹子婴,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 [7] [美] 斯蒂芬·F·科恩. 苏联经验初探[M]. 陈伟,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124
- [8] [法] 亚历山大·阿德勒. 苏联和我们[M] 王麟进,译. /苏联问题译丛:第6辑. 北京:三联书店,1980: 270
- [9] 叶书宗.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1卷[Z].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10] William Korey. The Future of Soviet Jewry: Emigration and Assimilation[J]. Foreign Affairs, 1979, (Fall): 70
- [11] Petrus Buwalda. They Did Not Dwell Alone: Jewish Emigration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67-1990[M]. Washington: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997: 134

责任编辑:仇海燕